

# 全球化的中国启航(下篇)

徐伟新

## 文化传播与文明共享

伴随着技术、贸易、货币等物质性产品的传播,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辐射,形成了“文明高地”。同时吸收、整合并改造外来文化,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多元包容的文化世界构建。张骞的“凿空”西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东西文化的交流与共享。

古代中国,汉字、儒学、律令等文化要素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又称“汉字文化圈”。汉字早在战国至汉代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公元4—5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均采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朝鲜世宗大王借鉴汉字结构创制韩文。汉字经朝鲜半岛又传入日本,日本借用汉字创制“万叶假名”,后发展出“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汉字始终是日本书面语的核心组成部分,日本的官方文献、律令、史书均以汉字书写。秦汉时期,汉字传入越南,成为官方文字直至19世纪。越南的科举考试、政府文书、文史经典均使用汉字,并在此基础上创制本土文字“喃字”。

随着汉字向东南亚的传播与使用,儒家经典、佛教典籍广为传播并被接受。958年高丽王朝引入科举制度,推崇儒学,朝鲜王朝确立崇儒抑佛政策。5世纪,百济(朝鲜半岛)博士王仁赴日教授儒学。604年,日本颁布《十七条宪法》,多个条例直接引用儒家经典。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最终在754年到达奈良。他携带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真迹,佛经,以及建筑、雕刻、医药等技术团队,其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金堂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建筑工艺,历经千余年风雨仍保存完好,被日本列为国宝。汉代至唐代在越南设郡县进行治理,儒学成为官僚体系基础。琉球王国在明代接受中国册封,引入儒家教育体系,建立孔庙和国学。

中国的律令制度也为东南亚地区广为接受。唐代律令制度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701年日本仿《唐律疏议》制定《大宝律令》,718年制定了《养老律令》。日本的行政架构也仿照唐朝,行二官八省,官员品阶、刑罚体系均效仿唐朝。11世纪越南李朝颁布《刑书》,13世纪陈朝制定《国朝刑律》,均受唐律影响。后黎朝时期颁布《洪德法典》,以中国唐律、大明律为参照,将儒家礼治思想制度化,明确规定“十恶”条款,以维护君权与家庭伦理。在朝鲜半岛,新罗统一后采纳唐代律令制,高丽王朝的《高丽律》直接参考唐律,朝鲜王朝的《经国大典》延续中华法系传统。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颇为广泛,如官员选拔的科举制,朝鲜自788年新罗时期实行“读书三品科”,958年则正式实施,后经936年后于1894年废止。越南自李朝时期(1075年)实行科举制,直至1919年被法国殖民者废除,历时844年。再如史学、文学、汉诗创作,成为东亚文人共同的传统。日本嵯峨天皇、朝鲜崔致远、越南阮攸均以汉诗文闻名。孝道、宗法制度、家族观念等儒家伦理,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规范。中华文明的传播促进了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形成共同价值观念、制度框架和书写系统的文化共同体。

中华文化对东亚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全面的,同时对欧洲的历史进程,如文艺复兴、大航海、宗教改革等也产生了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技术发

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和社会进程。第二类是商品和物质文化。如丝绸,不仅是商品,更是财富地位的象征。为获取丝绸,大量黄金外流,成为推动欧洲寻找新航路的动力之一。再如瓷器,在16世纪葡萄牙人开通直航航线前,中国瓷器通过中东传入欧洲,数量稀少,价值堪比黄金,这种工艺美术刺激了欧洲工匠不断尝试仿制,推动了欧洲瓷器制造业的发展。茶叶在明朝是通过海上贸易,经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岸传入。1607年,荷兰海船首次从澳门贩茶至欧洲,标志着中国茶叶直接销往欧洲的开始。茶叶传入欧洲后,其独特的健康价值备受消费者青睐,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还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兴起,如茶叶的加工、包装、运输等。第三类是思想观念。在18世纪之前,中华文化的思想观念通过阿拉伯、蒙古等中介间接传入欧洲,同技术、商品等物质文化的直接传入相辅相成,构成一股强大的东方力量,推动东西方思想对话,为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和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奠定了基础。

古代中国在输出自身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并予以本土化改造,构成早期全球化的知识网络。首先是宗教与思想的交融。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汉时期,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佛教正式扎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结合,形成独特的思辨体系。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历访中亚、印度110国,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完成了佛教教义的系统性引入。义净从海路西行,不仅带回戒律经典,而且详细记录了他在东南亚20余年所观察到的东南亚、印度的佛教习俗,以及南海商船航线与贸易。唐代禅宗兴起,将佛教教义与儒家、道家思想融合,完成从“胡貌梵相”到东方神韵的转变。佛教的传播不仅丰富了哲学思想,还催生了敦煌壁画、变文等艺术形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死观与审美。景教与伊斯兰教也都在唐代传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了景教教义及活动。泉州圣友寺、广州怀圣寺等早期清真寺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开端。

其次是物质文明的互通。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苜蓿、核桃、大蒜、黄瓜等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苜蓿成为汉唐时期马匹喂养的重要饲料。元代回回药炮制技术的设立,引入阿拉伯药物炮制技术,拓展了中医疗治手段。

再次是艺术与生活方式的多元融合。汉代乐府吸收西域乐舞,如《摩儿兜勒》成为宫廷曲目;唐代胡旋舞、柘枝舞风靡长安。服饰与建筑也深受外来文化影响,形成异域风情。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佛教造像中的“褒衣博带”取代印度袒露僧衣。唐代长安流行胡服,女子穿翻领窄袖袍、戴胡帽,展现开放气象。在建筑领域,唐代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模仿长安城而建,成为中亚城市规划的范本。饮食文化也趋向国际化,唐代长安的胡食店提供胡饼、奶酪等西域美食,波斯商人开设的酒肆中,胡姬弹奏琵琶、表演歌舞。

最后是科技与金融制度的借鉴。在唐代,印度医学传入,《千金翼方》中记载的

“悖散汤”(波斯医方),用于治疗气痢。元代宫廷中同时存在汉族医官、阿拉伯医官和吐蕃(西藏)医官。医学巨著《回回药方》系统引入阿拉伯医学理论,阿拉伯药物如乳香、没药也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天文学家吸收了印度的天文历法,将黄道十二宫引入中国历法,元代郭守敬编制《授时历》,参考了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元大都(北京)设司天台,邀请著名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鲁鲁丁前来任职,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仪器。商业制度也在吸收中进行

## 制度创新,全球治理的早期实践

海洋秩序的早期构建。郑和下西洋与同时代及后来西方主导的殖民掠夺式海洋秩序截然不同。在核心理念上,秉持“王者无外,怀柔远人”的政治理念,郑和团队不是征服者,而是传播明朝的德威,建立和维护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经济原则上,秉持“厚往薄来”,通过“赏赐”与“互市”的朝贡体系构建秩序基础,明朝对前来朝贡的国家给予价值远超其贡品的“赏赐”,如丝绸、钱币、瓷器等;在海洋秩序的构建方式上不是军事侵略或掠夺资源,而是威慑、保障安全、惩罚挑衅者。例如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郑和调解了当地王室与部落的冲突。郑和舰队还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朝贡礼仪和贸易流程,各国使团随郑和舰队或自己来华,在指定市舶司进行交易。郑和舰队详细绘制了《郑和航海图》,记录了航向、航程、港口、暗礁等,并建立了从中国到东非系列补给点和航线,为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海上交通,建立了一套“公共产品”。明朝的朝贡体系在其“厚往薄来”的远洋贸易背后,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贸易网络,奠定了早期全球化的深层逻辑。需要指出的是,“厚往薄来”的模式给明朝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以政治声誉而要而忽视经济利益是不可持续的。“怀柔远人”的政治主张并未延伸至民间,不鼓励百姓海外贸易和开拓,随着明朝内部政治转向保守,下西洋这一对外政策被制止。郑和下西洋所构建的海洋秩序展现了一种以和平、德政和互利贸易为基础来构建国际关系的可能性,它证明了在人类历史上,除了霸权和征服,还存在过另一种构建世界秩序的宏伟实践。

开创全球治理的经济范式。宋代建立的“公凭”制度(出海许可证)、“抽解”制度(关税征收)和“博买”制度(政府优先收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国际贸易管理体系。更具突破性的是,宋钱凭借稳定的币

## 结语

全球化不是一个从1492年才开始的线性进程,而是一个动态的、多种文明共同作用、分阶段的历史进程,是从局部互动扩展为全球性的相互依存网络。第一波全球化从东方启航,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开创性的角色。古代中国通过技术输出构建了全球知识网络,通过贸易塑造了经济联动网络,通过人口流动推动全球网络扩展,通过文化辐射形成东亚文明的共同体,通过制度创新提供了全球治理的最早范本。更为重要的是,开创了一条非殖民、非霸权的全球化路径,这为今天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最生动的案例。第二波全球化则是由西方大航海所开启的将美洲和大洋洲纳入全球化体系。至此,全球的互联互通形成。“郑和大交换”与“哥

伦布大交换”共同构成全球化的早期形态。近代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形成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国退出了全球化舞台中心,从主动引领者转变为被动参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货币体系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全球化有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中国重返全球化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可见,全球化从东方启航,古代中国是早期全球化的主导和中心。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实质上是进入这个早已存在的世界体系,并通过将范围连接到美洲和大洋洲,开启了全球化的新阶段。

(作者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来源:《学习时报》)